

费孝通 著

师承·补课·治学

留英记

开风气，育人才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人不知而不愠

补课札记



三联精选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费孝通 著

师承 ·
补课 · 治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承·补课·治学/费孝通著.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2.7

(三联精选)

ISBN 7-108-01602-8

I. 师… II. 费…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026 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面设计 宁成春

● ● ●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192 千字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8.50 元



张冠生摄

三联精选 缘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以来,本着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联图书的风格与特色。

多年以来,由于主要致力于推介新作,许多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无暇顾及重印,读者呼唤重印之声不绝。其中尤以一些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书,既是厚积薄发之作,落笔为文而又平易畅达,堪称书林经典,备受读者眷顾。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的必备品,或枕边的常读书。值三联书店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从半个世纪以来三联版图书中,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旧版,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辑为“三联精选”文库。文库秉承译域外菁华与开掘本土资源并重的传统,兼收著述与译作。收录作品力求篇幅短小,而且文字平易,借以体现我们一向注重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的理念。为方便读者庋藏,统一开本版式,重加录排校订。同时,基于面向普通读者的考虑,力求价格低廉。今后我们将秉此标准与宗旨,陆续精选,以副广大读者厚望。谨布区区之诚,希望得到人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8 月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目 录

目
录

留英记	1
开风气,育人才	41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58
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	69
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体质人类学	92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122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176
 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	 206
一、决心补课	206
二、派克来华	210
三、派克的早年	215
四、人生道路的选择	219
五、留学欧洲	225
六、深入社会基层	231
七、一段插话	238
八、芝加哥大学及其社会学系	241



九、派克进入社会学阵地	247
十、派克和汤姆士两人的结合	252
十一、从探险者成为拓荒者	256
十二、派克老师在备课	261
十三、欧战期间的派克老师	267
十四、派克老师走上讲台	275
十五、奠定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	280
十六、众口交誉的老师	288
十七、再说《引论》	296
十八、另一本老师的杰作	300
十九、未完成的种族关系研究	304
二十、跨越太平洋	312
二十一、人生苦短,探索未已	318
二十二、后记	328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	 338
一、重建社会学的方针	339
二、学科建设的速成、补课和队伍建立	347
三、理论和实际结合、教学和研究结合	354
四、“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	358
五、历史机遇和发展创新	365
六、知识分子的正气和第二次创业	373



留英记

我是 1936 年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生到英国去留学的。进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1938 年毕业回国。这里要追记的是这一段留英生活。但顺着回忆的思路联想到许多和这段生活有关的事，不受题目的拘束，也把它们写了下来。

一

先说我是怎样得到留学的机会的。

30 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



倍了。留学已多少成了变相的科举。有些大学生着了迷，搞得颠颠倒倒，这些形象对于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但是以留学和科举相比还有点不同：封建时代有资格大做其金榜题名美梦的人范围似乎广一些，至少传统剧目里足够反映出状元公这个人物在群众的想像中也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熬得过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会换得成光彩夺目的紫袍。留学却没有这么容易。这是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讲投资，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

留学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这里有“官费”、“自费”、“公费”等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养洋务人才，派留学生出洋，但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还很多不愿离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国，更少愿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因此，留学生的费用全部得由官家负责，此之为官费生。留学回来的人，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学而优则仕，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守则，留学回来有官可当，群焉趋之。官费留学的机会逐步就被达官贵人所把持，用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和这些有权选派留学生的权贵没有关系的就沾不着官费之光。沾不着光而又有钱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钱，此之为自费生。

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费生和自己家里出钱留学的自费生之外，还有一条让既没有钱又靠不上势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学机会的路子，这是一条帝国主义安排下的路子。帝国主义者拿钱出来收买中国的青年，为了要培养为它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必须找一些好名好义来掩盖一下。所以这条路子的花样多，走起来也比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利用“退回庚子赔款”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最初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称清华学堂，又改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叙述，不必在这里多说。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它和官费、自费有所不同。它是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来招生的，因而使得许多原来在钱和势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学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学的机会，使他们也可以大做其留学美梦。这种通过考试取得别人的钱去留学的则称之为公费生，以别于官费和自费。

我是靠清华的公费出去留学的，但是又不同于经过“留美考试”的公费生。为此，得把清华公费留学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或是后来的清华学堂，都是专门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补习的学校，是一个“加工厂”。招收的是十四五岁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要经过七八年才送去美国留学。凡是考得上这个学堂的就取得了留学资格，加工期满，照例一定放洋（除了



招收这种小学毕业生之外，也有少数年龄较大的，在清华园住上几个月就出洋的，此外还有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清华补助等)。1925年这个办法改变了，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1928年学校的名称也改成了清华大学，意思是不再做加工厂，而是个出成品的工厂了。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并不是个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清华还是每年要为美国遣送一批留学生。于是另外定出了一个留美考试的办法，报考的资格也由小学毕业提高到了大学毕业，而且不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也同样可以报考。每年在报上公布当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额。这叫做“留美考试”。另外，清华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各系的助教。我是以研究院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公费的。清华的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生，规定至少学习两年，提出论文，经过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每年在毕业生中按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最后毕业考试的分数，经学系的推荐，挑选若干，给予公费留学的机会。

当时这种性质的公费留学，除了清华的留美考试之外，还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试，听说中法大学也有类似的公费遣派留学生的办法。在30年代下半期，这类公费留学生的数目在留学生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会等团体，也为外国吸收我国学生安排一些路子，但是这些路子并没有上面所说的那样明显，而且也比较分散。因为我在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之前在燕京大学读过三年书，所以对这些路子也知道一些。

原来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种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钱的来源是私人的捐款。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常要逃避捐税，假冒伪善地捐些钱做做“功德”，帮助清寒学生上学和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是其中之一。各大学也以此做广告来招揽学生，每年在“校览”上公布，说明给予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申请，受惠的学生不受国籍的限制，甚至也有专门指定给哪一国留学生的。

这一类助奖制度并不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而是由各大学所设的审查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所提出的机关或个人的推荐书来挑选。推荐书自然都是为申请人说好话的，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哪个推荐机关或推荐人腰杆子粗和哪个大学的关系深。推荐人也就举足轻重，成了经纪人。美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这些学校、青年会等就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为他们的学生或朋友找留学的机会。由于这种助奖制度本身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有资格推荐的人可以推荐也可以不推荐，推荐了有没有效也不一定，所以在这些教会学校里虽则表面上并不像清华一样标出留学科目的清单，公开号召角逐，而



实际上为了争取留学机会也对师生关系、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学生想得到推荐，他就得多方接近有势力的教授，博得他的青睐。那些教授就又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在学生里发展他个人的势力。而且同学之间为了争取这种留学机会，勾心斗角，费尽心机。

当然，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还有自己刻苦积蓄，到外国去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以及更有组织的“勤工俭学”等等路子，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去说了。

二

我到英国去学的是人类学。在此可以谈一谈我怎么会选上这一门学科的。

我在燕京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从燕京的社会学系，进入清华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国去学人类学，虽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但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这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段历史，这里把它记下来或许也是有意思的。

燕京大学之有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字叫甘布尔(Gamble)的美国人创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到中国来做青年会工作，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和伯吉斯(Burgess)合写了一本《北京调查》的书。他进一步，想培养一批中国人能像他一样一面做青年会工作，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

国所赚去的钱已不少，就拿出一笔来做这件事。拿这笔钱出来还得有个名义。于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叫“普林斯顿在中国”的基金，交给燕京大学，作为培养社会服务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学拿了这笔钱先办社会服务系，后来改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添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合成为法学院。

这一段历史说明燕京的社会学是从青年会工作和社会调查这两个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从美国传入的，培养目标是社会服务的人才。这一套字眼在美国人听来很容易懂，因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部分，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人，这些字眼的含义不加以注解也就不会明白。青年会工作是“社会服务”的一种，它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电影院、浴室、弹子房、运动场、业余补习学校，一直到旅馆的综合体。青年会是基督教主办的，所以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它实际的作用就是通过满足一些市民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来进行基督教的宣传，也就是从生活服务人手来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传教工作。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这一类的社会服务特别发达，那是因为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就会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激起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



盾,剥削阶级拿出一些钱来,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救济”和弥补。要进行这项工作,一方面要有一批人去了解社会情况,发现“社会问题”,这叫做社会调查;一方面又要一批人去发放救济款,去做“思想工作”,去办理儿童教养所等等,这叫做社会工作。燕京大学最初传入的“社会学”,就是这些名堂。

我是1930年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社会学系的。当我挑选这个学系时,并不明白社会学是什么东西,我当时抱着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投入了这个学系。我在东吴时读的是医预科,为了鼓动反对校医打人的一次风潮而受到学校当局要我转学的暗示,离开苏州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后,南北军阀混战的时期,在文化战线上正在热烈展开社会史的论战。这许多刺激使我抛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决心要研究一下中国社会。所以到了燕京,注册进了社会学系。

我这个愿望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愿望的青年人是不少的,而且有许多青年接受党的领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些像我一样的人,还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又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要求另外寻求一个出路。所以在这时燕京社会学系冒出一种发展理论社会学的要求,现在看来也并不是偶然的。所谓理论社会学者是和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实用社会学相对而言的,实际

上指的是那一套进行社会改良的理论。

回想起社会学在西洋的历史也一直有这两个方面,例如19世纪50年代写过《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的研究》(即严复所译《群学肄言》)的英国的斯宾塞就是这种所谓理论社会学的祖师之一。他想尽各种理由来证明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就到了最完善之境,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全都不及它的优越。这样就在思想战线上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好景不长,它本身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严重,百孔千疮,昭昭在人耳目。为了要缓和阶级矛盾,麻痹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能不对所谓“社会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以英国来说,19世纪末年就有蒲斯(Charles Booth)对伦敦工人生活进行过规模相当大的调查。这一类社会调查的目的一方面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加以解释,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设计“改良”的方案。前一方面就形成“社会理论”,后一方面就形成“社会工作”,譬如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所谓贫穷问题,一些理论家就出面来说工人阶级贫穷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而是出于孩子生得太多,话当然要说得更复杂些,但当时的“人口论”骨子里就是这句话。这就算是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也就采取了许多所谓“最低工资”、“人口节制”、“贫穷救济”等等具体措施来减少工人们“铤而走险”闹革命的危险。这就是社会工作。

